

古典诗词名家

三曹诗选

孙明君

选注



三曹诗选

孙明君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曹诗选/孙明君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649-5

I.三… II.孙… III.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三国时代 IV.I222.7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412 号

书 名 三曹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孙明君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³/₄ 字数 123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649-5/I·617

定 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有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

言

建安时代被学界誉为“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个时代诗人辈出,云蒸霞蔚,“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诗人们在创作中抒发理想,描绘民瘼,呈现出慷慨悲凉的诗歌风貌。其中最为杰出的当推曹氏父子。

东汉末年,三大社会矛盾激化:一、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延熹二年(159)、建宁元年(168)和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团三次发动突然袭击,分别谋杀了外戚大将军梁冀、窦武、何进。何进死后,袁绍捕杀宦官,结束了东汉社会宦官与外戚交相擅权乱政的局面。二、清流士人与浊流恶势力的较量。延熹九年(166)、建宁二年(169)两次发生党锢之祸,清流士人遭到了残酷镇压。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境。此后,中国大地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岁月。随着社会政治的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加重,学术思潮与士人思想观念也大为改观,经学神学体系全面崩溃。汉末批判思潮出现,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徐幹,对社会进行冷峻的批判与反思。士人面对现实作出了不同的抉择:或者放纵情志,追求生命本然的享乐;或者隐居山野,躬耕垄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前出师表》);或者平暴除乱,投身于安时济世的时代洪流中。

这是一个呼唤英雄也诞生了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呼唤诗人也诞生了诗人的时代。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时代的精英,也是时代的歌手。

—

曹操(155——220),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早期对汉室抱有幻想,入仕之初,他打击浊流恶势力,上书为党人领袖请冤。后来,他目睹了东汉政权的腐朽,逐渐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他利用自己日隆一日的政治军事权力,走上了重造“天下”之路。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帝。“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现存诗歌二十馀首,这些诗篇或写民生疾苦,或抒一统天下之志,悲凉慷慨,刚健有力,气韵沉雄。“太祖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抒发理想壮志的名篇有《短歌行》《龟虽寿》等。曹集中流布最广、堪称压卷之作的是《短歌行》(对酒当歌)。魏源说“对酒当

歌，有风云之气”。（《诗比兴笺·卷一》）赤壁之战败北后，曹操见孙刘联盟一时难以攻克，转而经营北方。日月迅迈，老之将至，眼看自己在有生之年难以完成大业，于是，他写下了令后世慷慨之士击节不已的《龟虽寿》。

曹操诗歌感情沉恻，悲笼域内，表现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曹诗的忧患意识，向外表现为忧国忧民；向内表现为忧自己年寿不永，无法完成统一大业。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突出反映在“诗史”性作品中。《薤露行》《蒿里行》乃“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卷七）此两篇前后相衔，可视为汉末战乱诗史的上下篇。诗中既有细节描摹，又有宏观鸟瞰，加上政治家开阔的胸怀和军事家的洞察力，使之在同类作品中卓尔不凡。曹操对自己麾下的将士也颇为关怀。《苦寒行》抒写了战争时期行军之苦。曹操表白自己怜悯士卒，体贴士卒，并不想让士卒跟随自己去忍受征战之苦，但是要平暴除乱，又不得不如此。

年寿不永，功业难建的忧患主要反映在创作于晚年的游仙诗中。曹操的游仙诗，既有享乐主义思想倾向，也有忧患意识的再现。前者暴露了作者思想中庸俗的一面。后者与言志之作同旨。曹操晚年热衷于写作游仙诗，并不是完全相信神仙道教，主要是借以消解生命忧患意识。

对曹操诗歌艺术风格的体察，古人有大体相近的看法。钟嵘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敖陶孙曰：“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王世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凉。”（《艺苑卮言》卷三）胡应麟曰：“（魏武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诗薮》外编卷一）周履靖曰：“魏武帝，自然沉雄。”（《骚坛秘语》卷中）徐世溥曰：“苍茫浑雄，自有开创之象。”（《榆溪诗话》）陈沆曰：“曹公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诗

比兴笺》卷一)刘熙载曰:“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艺概·诗概》)古人将曹诗风格归纳为悲与健两个方面,是基本准确的。这里所强调的是悲与健不是孤立的,而是悲中有健,健中有悲。悲中有健即为悲壮,健中有悲即为雄健。悲壮与雄健凝成了笼罩大地的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给曹诗以刚健之力、浩然之气;深沉的忧患意识给曹诗以凝重之态、悲壮之势。曹操诗歌的这一风格在中国诗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建安时代,“叙景已多,日甚一日”(吴乔《答吴季野诗问》)。曹操是这一转换中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诗中写景成分较多,第一首由自然意象构成的诗即出自其手,这就是他的《观沧海》。曹诗景物描写中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阔大雄奇之象的偏爱和阔大雄奇之境的创造。通观曹诗,不难发现:诗中多写萧杀和秋冬之景,绝少春风和煦、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阳春天气。所写的动物多是凶禽猛兽,不写温驯的家禽、依人的小鸟。所写山水以高山峻岭、深湍急流为特征,不写青山秀水。

曹操在诗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曹操在戎马倥偬之中,“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领导了建安诗歌的新潮流。此其一也;其二,他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建安风骨”的内涵,促成了“建安体”的完成;其三,他率先借古乐府写时事,为乐府诗闯出了一条新路,给唐代杜甫的新题乐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础;最后,曹诗在摆脱两汉经学家诗教说的束缚之后,大胆地反映现实,讴歌理想,将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从哲学思想转化为文学艺术;并以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灌注于诗境、诗风,创造了苍凉悲壮、雄健慷慨的诗歌风格和阔大雄奇的审美境界。

二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他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从政途上看,曹丕很幸运。建安十六年(211)正月,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封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曹丕袭爵,嗣为丞相。十月曹丕称皇帝,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改元黄初。他在政治上效法汉文帝,实行以德化民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张轻刑法,薄赋税。改变了曹操用人唯才的政策,实行“九品中正制”。

曹丕现存诗四十多首,“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沈德潜《古诗源》)其诗多写游子思妇之情,对人生进行哲学的思考。他的《典论·论文》被学术界视为文的自觉的号角。

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1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使人不能不面对人类必然的归宿——死亡。曹丕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哀伤。《短歌行》是思念亡父之作。战争、疾病随时会夺走亲友的生命。“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曹丕《与吴质书》)“回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曹丕佚题诗);“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善哉行》)“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善哉行》)。

因为社会的动乱、生计的逼迫,多少士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于是游子思妇成为建安时代的普遍现象,曹丕的诗歌深刻地

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忧伤情思中的生命意识。游子飘泊在外,孤苦无依,有家难回,对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冷暖体味尤为深刻。曹丕《杂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了人生的孤苦飘零,有一股苍凉之气贯注其中。与游子之愁相应的是思妇情思,曹丕的《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作为男性的曹丕,特别善于揣摩、描摹女性的心理,诗作呈现出一种清绮婉约的阴柔美。这种视角、这种手法在宋词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曹丕笔下的女性都是美丽善良的化身,她们往往代表人性中至善的因素,而她们的命运却是不幸的,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既是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控诉,也是对人生无常、生存空虚的揭示。

诗人对于生命意识的反映不是只借助于身外的现象从侧面展示,亦有直接的抒发;不是只有对于生命痛苦的描绘,亦有对于痛苦的超越、对自由状态的追求!诗人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中开掘生命的深层结构,展现出生命个体的不懈追求过程,显示出生命的伟大。曹丕的诗则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苦苦求索,其诗更多地表现出迷惘的心绪、燥动的情思、忧愁难解的哀怨。

有时诗人安于享乐,诗人从中体会到返依自然生存状态的快乐,但作为有抱负的志士,作为一位政治家,诗人的心中还有一个痛苦自我。这些诗句的存在,标明了诗人的不同流俗、不同纨绔子弟之处,他并不在轻歌妙舞、美酒佳肴中沉湎。长篇乐府《大墙上蒿行》细致地表现出他不安于物质享乐、执着探求人生真谛的思绪。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成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在诗人的探索历程中,爱情也是他着意的一个方面。《善哉

行》(有美一人)、《秋胡行》(朝与佳人期)等诗反映了他对佳人的倾心。将爱情不能实现时的失望、焦灼、难耐之情和盘托出。他的爱情诗多相失之苦,少相得之乐,常常咏唱一种有缺憾的爱。表现出惘惘不甘的情思,这与诗人对人生的理解是一致的。

作为政治家的曹丕当然是不会为了爱情而忽略人生的要义,他的探索并未就此止步。于是,他走向功业,以英雄气代替文士气。治平天下、建功立业是建安时代的主流,这一点在曹丕身上亦有反映。他热心于仕途功业,具有政治家的精明练达。

曹丕诗中多“忧”字。在诗人的笔下,“上山采薇,薄暮苦饥”的游子(《善哉行》其一)充满了“忧”情;秋日深夜,独守空闺的少妇充满了“忧”情;出人意外的是贵公子曹丕自己也充满了“忧”情,这在《大墙上蒿行》等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晰。曹丕《丹霞蔽日行》表明,当诗人面对着丹霞、彩虹、流水、明月等象征着幸福圆满的美景时,内心仍然充满了“忧”情。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忧”,使曹丕诗歌意境呈现出纤巧细密、清新明丽之特色。

以曹丕为代表的在思想上反映生命意识,在形式上讲究华丽的“魏响”,崛起于中古诗坛。其巨大意义首先在于突破了两汉儒学诗教。经学家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力。“歌功颂德”,“刺过讥失”的济世诗学教条并不能生产出活泼的诗歌。建安前期,曹操、七子等人用诗歌来反映动乱现实,使其诗具有“汉末实录”“诗史”之价值,较之于经学家的诗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古代诗人因受史的意识支配,往往以时事、政治事件为其第一位的表现对象,忽略了史学与文学的不同。曹丕等人的诗歌又有了新的开拓。

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古诗源》卷五)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临

摹进入到对丰富而隐密的心灵世界的展示。曹丕诗歌以深邃的哲思、哀婉忧伤的情调所反映的生命意识使建安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深刻。

三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的弟弟。子建的生活与创作以“司马门事件”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曹植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文学上的才华，“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请）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邳铜爵（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曹操在很长的年月里未立太子，曹丕和曹植兄弟都有被封太子的可能，有几次曹操几乎要宣布让曹植做太子，但后来曹操还是选择了曹丕。曹植的失宠，最主要的原因是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同时也由于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后期的曹植虽然名为藩王，实为囚徒，时刻有性命之忧，“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数年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曹植《黄初六年令》）“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同上）曹睿

时代,从生活上有了很大改变,但在政治上依然受到猜忌和不信任。“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三国志·魏志·曹植传》)

曹植现存诗歌八十多首。身处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建安时代,遭受“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吁嗟篇》)之变故的曹植,其诗歌充满了悲哀、忧伤、怨怼,则自是情理之中的了。前期诗歌以游乐言志赠别为主,风流自赏,豪健洒脱,然亦有忧世、忧生之叹。曹植的《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单纯读这类诗,的确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谢灵运语)的印象。他有时沉浸、陶醉于这种贵介公子的享乐生活,乐而忘忧。但斗鸡走狗、金觞肴饌、红颜妖姿带给予建、子桓兄弟的,并不都是欢乐的感受,透过这表面的欢乐,他们往往会体会到更深刻的悲凉。子建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它与《名都篇》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两首诗恰恰表现了曹植人格的两极。

赠别是子建早期诗作的另一主题。离别,本来是黯然伤神之事,更何况在战乱频繁的建安之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译本,第13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曹植对友情诗有重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是指曹植友情诗的数量,更

重要的是指其友情诗的质量。

在曹丕、曹睿时代,“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际遇,使曹植的诗歌充满了哀愁。徐伯虬云:“(子建诗歌)宛而不险,质而不靡,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幽愤而有馀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李梦阳、王世贞评点《曹子建集》)李梦阳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馀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同上)幽愤、伤悲等消极情感正是子建后期诗作的情感特征。

曹植诗歌有建功立业之志,与曹操诗歌之“悲情”相通,亦有生命意识之念,与曹丕之“忧境”相通,但更多的是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到挫折之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深挚沉痛。故这里姑且称之为“哀怨之情”。其《赠白马王彪》是后期诗歌的代表作。“此诗气体高峻雄浑,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抒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方东树《昭昧詹言》)。

曹植早期诗歌本已多有对生命悲剧的体认:“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幹》)“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氏》其二)……如此深重的悲叹发自于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王子之口,不能不令人深思。黄初年间,当丁氏兄弟等亲植派先后被剪除,当任城王不明不白地死于京师,当有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毛求疵,子建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被加上“动乱国经”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此时他心中的忧悲忧患不只不同于他早年的慨叹,亦不同于中古时代普通文士的忧患意识。他此时的叹息饱蘸了血、饱蘸了泪,是浸透血泪的哀叹。二是对于生命本体旷世孤独的体验。曹丕即位之初,即遣诸侯就国。从此,子建便

处于被禁锢被封闭状态。其《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其实物质上的贫困还不是最残酷的迫害。更严重的是对其生命对其精神的威胁与折磨。子建后期处于曹丕爪牙的密切监视之中，这些监视者之中既有奉迎圣上旨意的小人，亦有专职的特工人员。他们联合起来，沆瀣一气，投石下井，欲置子建于死地。他后期诗歌反复申诉愁苦之情：“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浮萍篇》）“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吁嗟篇》）“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暮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杂诗》其一）后期的子建，只有将沉重的悲哀、弥天的愁苦独自吞咽，独自咀嚼。

这浓烈而无尽的哀愁便导致了他深切的“怨”情。他怨恨命运的不公，怨恨曹丕骨肉相残，怨恨奸险小人的无耻行径。怨曹睿只将自己视为圈牢之养物，空抱利器而无所施。在《赠白马王彪》中他说：“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这是对命运之神的指斥。“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兼白黑，谗巧令亲疏。”是对监国谒者、有司之流的怒斥，其中未尝不包含对曹丕的怨恨，“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刘克庄《后村诗话》）其《野田黄雀行》作于曹丕杀害丁氏兄弟之后，曹植眼睁睁地看着好友被人杀害，而无力救援，于是写出此诗，诗对“罗家”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曹植诗歌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诗教的典型代表。子建自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赠丁仪王粲》）看来他对中和之美深有体认。黄节说：“陈思之怨独得其正”（《曹子建诗注》），可谓一语破的。《赠白马王彪》是子建怨气最盛的诗篇，刘

克庄曰：“子建于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责躬》上表，而不敢废恭顺之礼，卒以此自全。诗作于诸王凜凜不自保之时，而其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诗中所谓‘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盖为灌均辈发，终无一毫怨兄之意。处人伦之变者，当以为法。”（刘履《选诗补注》卷二引）“终无一毫怨兄之意”，显然与事实不符，曹植不忍或者不敢将怨兄之意明明白白、淋漓尽致地写出，倒是真的。在《豫章行》其二中，他试图用骨肉亲情来打动曹丕的心。《怨歌行》以周公自况，极写为臣之难，却以“为君既不易”开篇，意在表明他对于为君之难亦颇为理解，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理由。被后人视为千古绝唱的《美女篇》也是典型的“怨而不怒”之作。本诗乃曹植后期处境和心情的写照。“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夫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刘履《选诗补注》）。

怨而不怒的另外一种写法是借弃妇之形象来曲折吐露自己的怨怼，曹植诗集中之弃妇诗皆具有哀婉动人的艺术魅力。其《七哀》写一种深切的哀怨之情。刘履《选诗补注》云：“《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沈德潜《古诗源》曰：“《七哀诗》，此种大抵思君之辞，绝无华饰，性情结撰，其品最工。”诚是。子建温柔敦厚之性情于弃妇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浮萍篇》“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宝香山人《三家诗》曹集卷二）弃妇对其夫有指责亦有眷恋。眷恋情深如海，指责委婉温和。关于《种葛篇》，朱绪曾《曹集考异》云：“此诗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慨之辞。篇中葛蔓、棠棣，皆隐寓兄弟之意。”对兄长抱有殷切希望，希望兄长有一天会回心转意，重续旧好。对眼前的被抛弃被冷落，